

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

为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 贡献原创性见解

■王健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全人类共同利益、秉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立场，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度提出的重大论断。这一论断不仅触及价值世界的本质与规律，还以批判性思维回应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话语霸权，为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贡献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原创性见解，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文明范式转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指引和普遍遵循。

时代要求

共同价值是人类在交往实践中形成的普遍认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全球条件下的必然展开。

全球化进程催生的系统性风险，使价值共识成为生存性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气候变化、环境恶化、全球卫生、恐怖主义、核战争等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存在性危机”，要求建立基于共同命运的价值理性基础。由此，全人类共同价值成为应对种种现代性危机的伦理回应，致力于国际社会的合作应对共同挑战提供精神指引和道义支撑。

人类交往的普遍化，为价值共识的生成创造了历史条件。进入21世纪，国家与民族间的联系日趋紧密，推动不同文明突破地域、种族与文化界限，在交流互鉴中碰撞融合。从历史趋势看，跨文明的共性问题在实践中不断积累，进而在和平共处、发展共享、公平正义等根本性价值规范层面逐步凝聚起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叠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讲：“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对长期交往中形成的共

识性理念的提炼与升华，体现了文明互鉴进程中中和不同的辩证逻辑。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构成对西方话语霸权的批判性超越。长期以来，西方社会有意识地将自由、民主等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制度价值抽象为超历史的“普世法则”，实则服务于地缘政治扩张，成为“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这种价值单边主义未能解决全球性问题，反而会加剧价值领域的对抗与分裂。

价值的普遍性必须建立在实践的共同性之上，而非某一文明的自我中心投射。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将某一种民族文明形态的价值或某几个国家和人民的价值作为“普世的”或“普适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民族、国家和人民，而是集全人类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多样价值的异中之同，是求同存异的结果，是在承认世界文化和文明多样性，承认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人们存在不同价值观的基础之上，追求全人类价值的最大同心圆和最大公约数。

同时，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全世界人民以宽广的胸怀理解不同文明环境下的价值内涵，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民对文化价值实现路径的各自探索。由此，有力回应了全球化时代价值多元与秩序重构的现实挑战，既打破了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虚伪性，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价值基础与道义支点。

核心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要义，为我们把握其科学内涵提供了根本遵循。

和平与发展是共同事业，也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物质根基。和平是人民的永恒愿望，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其中，和平是人类文明延续的根本保障，发展是实现人

民幸福生活、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关键路径。和平与发展创造稳定环境，发展为和平提供物质基础。没有和平，发展成果可能毁于一旦；没有发展，和平将因贫困与不公而难以维系。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是全人类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

公平与正义是共同理想，更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规范维度。作为人类社会长期追求的核心价值，公平与正义关乎利益分配的合理性与制度安排的正当性。全球层面，公平意味着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平等享有发展权利与国际规则制定权，实现权利、机会、规则公平；正义则要求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践行正确义利观，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关注支持发展中国家需求，推动全球资源与发展成果更公正合理分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办。我们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推动各方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我们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合理化，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民主与自由是共同追求，也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终极指向。民主与自由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人们实现自我发展与尊严生活的内在追求。民主不仅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安排，还是全球治理的伦理要求，体现为国际事务的共治性与规则制定的参与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而是各国人民权利”。自由意味着各国人民有权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与制度模式，有权表达合理诉求，有权追求美好生活。全人类共同价值所倡导的民主与自由，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性价值”与“过程性共识”。它解构了西方将特定民主模式“普世化”的意识形态话语，重申民主的主体性根基在于人民主权的在地性实现。

进一步看，和平与发展构筑人类生存与进步的前提基础，公平与正义确立社会运行与国际秩序的制度规范，民主与自由指向个体解放与集体福祉的终极目标。六大价值环环相扣、层层递进，

共同回答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把握这一价值体系，必须坚持系统思维，注重其整体性、协同性与实践性，进而真正发挥其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基石的引领作用。

实践路径

全人类共同价值并非先验理念，而是在人类实践交往中历史性生成的。新形势下，价值共识唯有转化为集体行动，才能在实践中确证自身。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提出并践行一系列重大倡议，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转化提供了可行路径。

比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人类文明演进视角看，共同体的发展跃迁是从“实然共同体”迈向“应然共同体”的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命运互嵌、责任共担、价值共生，主张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主权绝对主义与文明等级论，构建了一种以“关系理性”为基础的新型全球秩序观。

又如，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其中，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问题的总钥匙。以“发展优先”回应“发展赤字”，推动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现实支撑。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本质特征。打破“文明冲突”迷思，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增进理解与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共同发展，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营造文化生态与社会心理基础。

进一步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现代性价值困境的深刻超越，以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辩证思维，重构全球价值共识的生成逻辑。它不仅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指明了方向，更彰显出引领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思想伟力。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新思想：标识性原创性概念

构建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

■陈选娟

日前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建设金融强国》，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积极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本质的认识，不断推进金融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积累了宝贵经验，逐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逐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一个重要的学理性支撑就是“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科技浪潮重塑全球经济格局、中国金融实践深度变革的背景下，构建植根本土、面向世界的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成为支撑金融强国建设的核心命题。这一体系绝非封闭自洽的“学术盆景”，而是以破解中国问题为核心、以回应世界级难题为目标的知识创造工程。

理论根基——一方面，从“抽象经济人”到“现实的具体人”。

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深植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结合。其本质在于超越新古典范式的“抽象经济人”假设，构建以“现实的具体人”为本位的分析框架，确立“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定位，反对资本至上的逻辑，反对脱离实体经济、资本自我增值游戏、拒绝通过信用泡沫维持表面繁荣、拒绝爆发周期性危机。

价值层面，坚守“金融为民”的核心理念，强调金融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践行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这既吸收中国古代表述“子母相权”等思想精髓，又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利率市场化、数字金融等实践创新，形成具有主体性的学理范式。

方法论层面，运用辩证思维整合风险防控与创新驱动，形成“监管沙盒”与“创新容错”的动态平衡机制，并创新货

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它构建严格遵循“两个结合”原则：既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基，结合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实际，又汲取中华传统的“民本”“义利”等思想精华，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方法论指导。

另一方面，银行与证券理论的守正创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解货币金融问题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指导，即坚持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揭示金融活动依附并服务于价值生产的本质，强调金融资本的扩张性及其内在矛盾。在这一理论指引下，中国金融实践的探索，如旨在全面衡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社会融资规模”指标以及统筹资产负债表与金融稳定的“双支柱”宏观调控框架，有效突破了西方货币数量论等传统理论的局限性，为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防范系统性风险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银行体系的发展历程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色。其理论渊源始自晚清对西方银行制度的引进与实践，催生了早期现代银行。新中国成立后，逐步搭建起功能齐全、分工协作的多元化现代银行体系。以本国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包括关于转型金融、普惠金融及宏观审慎管理的探索实践，为现代银行学提供了重要启示。

中国证券领域的发展体现出从思想借鉴到制度创新的完整脉络。加快建设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发展多层次股权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深化常态化退市机制；发挥好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支持科技创新作用，强化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功能，对构建与之相应的本土化知识体系提出了一系列课题。

发展亮点——一方面，金融新范式的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创新逐步构建起“目标—体制—政策”三位一体新范式。

目标上，锚定服务实体经济，科技金融以多元手段赋能创新，绿色信贷助力低碳转型，体现了金融功能观的价值跃迁。

体制上，从“大一统”向多元化、多层次体系转型，契合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适配性的要求。

政策上，创新社会融资规模指标，构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不断丰富宏观金融调控理论。

另一方面，金融方案的全球化实践。中国在普惠、绿色及数字金融领域的解决方案，彰显出鲜明的系统化创新与深度实践特质。

普惠金融领域，政策协同与工具创新深度融合，通过构建多层次政策体系与创新金融产品，为金融资源精准流向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与可操作的实践路径，有效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绿色金融领域，绿色债券规模持续领跑全球，碳市场机制不断健全，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进一步拓展气候金融理论的边界。同时，凭借网上转账、移动支付和数字资产，开创数字普惠金融新范式，推动金融服务在场景创新、用户体验和风险管控等方面实现升级。

前沿研究——先看金融科技的模式重构。

在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进程中，金融科技的范式重构可以提供关键突破口。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入金融领域，不仅重塑金融业务逻辑，还催生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实践模式。比如，移动支付的全球领先、数字信贷的广泛覆盖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丰富了全球金融科技理论宝库。

再看绿色金融的蓬勃发展。

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核心框架可归纳为五大关键要素：标准体系，信息披露，激励约束机制，产品创新，国际合作。其中，商业银行通过制定绿色信贷标准，开发光伏贷与绿色金融衍生品等前沿工具，有力丰富了绿色产品供给；将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指标深度纳入风险评估与

信贷审批流程，推动环境风险内部化。

此外，绿色债券市场持续扩容，碳中和债、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创新品种涌现，彰显中国在全球绿色金融领域的实践深度与引领作用。这一蓬勃发展的态势不仅体现了政策与市场的协同驱动，也反映了金融部门对“双碳”目标的战略性响应，有力推动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绿色金融板块的构建与发展。

接着看新质生产力与场景革命。

数智技术催生的产业、消费、治理三大新场景，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本，多元的研究视角以及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验证场景，助力构建兼具科学性与实践性的中国金融学知识架构。

产业端，工业互联网金融平台以海量数据为支撑，精准对制造业企业融资需求，并降低融资成本；消费端，移动支付与数字人民币的普及，重构支付生态，推动消费金融模式变革；治理端，金融监管平台整合数据实现风险早期识别预警，进一步丰富金融风险理论。

这些场景实践彰显中国金融学在新质生产力领域的自主探索与创新，为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注入内生动力与思想活力，推动中国金融学在全球学术竞争中占据独特地位。

总之，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路径彰显了从问题导向的本土化创新到全球性金融谜题破解的双向突破，形成了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价值锚点、以系统辩证思维为方法论特征的理论框架。未来，可进一步深化数字金融、绿色金融、金融场景与金融治理的理论融合，从体系构建走向范式创新。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蔡爽

在数智技术迅猛迭代与知识生产模式深度转型的双重驱动下，传统学术传播与发展的生态格局正经历一场全方位、深层次的重构。长期以来，高端学术地位始终由体制内学术力量主导，形成了自己的知识生产与传播闭环。自媒体的蓬勃兴起与体制外学术力量的快速崛起，开始打破传统格局。在此变革语境下，学术大众化优势的充分释放、知识跃迁的顺利实现以及知识结构的转型升级，构成学术生态重构的核心议题。

内外博弈

传统格局下，知识生产活动多存在于精英学术圈层，学术传播高度依赖传统学术期刊、线下学术会议等渠道，存在传播效率低下、受众覆盖面窄等问题，并对体制外学术力量进入设置了较高的准入门槛，一定程度上造成学术生态创新动能与发展活力不足。

自媒体的普及与应用，正在打破传统学术传播的渠道壁垒，为更多体制外学术力量提供了低成本、广覆盖、高效率的传播与发声平台。体制外学术力量凭借贴近实践场景、反应灵活高效、内容通俗易懂等优势，迅速切入传统学术传播的空白领域，展开“跑马圈地”式布局与拓展，客观上推动学术资源从体制内向体制外的流动与优化配置，催生形成多元主体共生共生的学术竞争新格局。

学术不是象牙塔的孤品，而是滋养社会的活水；大众不是学术的旁观者，而是文化创造的生力军。学术大众化并非学术内容的“降维妥协”，而是打破学术研究的壁垒，推动专业学术知识走向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实现学术价值的社会转化与全民普及，让学术研究更接地气、真正服务于社会发展需求。

作为学术大众化传播的载体，自媒体的赋能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传播场景的多元化适配。通过短视频、微信公众号、线上直播、知识社群等多种形态，将学术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内容产品，精准适配不同受众的知识接受习惯与信息获取场景。

其二，互动机制的即时化响应。受众可通过评论、私信、社群讨论等方式与内容创作者直接互动交流，形成“知识传播—反馈—迭代—内容优化—精准传播”的良性循环体系。

其三，内容供给的差异化互补。体制外学术力量多聚焦于实践导向、应用导向的学术内容创作，重点弥补体制内学术研究偏重理论探索、易与实践场景脱节等方面的短板，有效满足社会大众对实用型、普惠型学术知识的需求。

学术大众化优势的充分释放，不仅让体制外学术力量在“跑马圈地”过程中获得受众认可与影响力提升，更重要的是为知识跃迁奠定坚实的基础——广泛的受众参与、多元的反馈意见，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全新的研究视角、鲜活的问题意识与丰富的实践素材，推动知识生产模式从传统的“精英主导型”向现代的“多元共创型”转型，为知识体系的突破与升级注入新的动能。

生态优化

知识跃迁：大众化基础上的质效提升——知识跃迁特指知识体系在数量积累达到临界值后，通过要素重组、视角革新、边界拓展、范式升级等方式实现质的飞跃，核心前提在于知识传播的广度与知识互动的深度。学术大众化打破传统知识生产的封闭循环模式，推动体制内的理论知识与体制外的实践经验、大众认知形成深度碰撞与有机融合。这种跨圈

层、跨场景的知识互动能够有效催生新的研究课题、新的理论视角与新的知识成果，推动知识体系从“小众精英化”向“大众共创化”实现跨越式发展。例如，体制外学者通过自媒体平台收集的大众对公共政策的反馈意见、实践困惑等素材，能够为体制内的学术研究提供鲜活的实证支撑，推动政策研究从理论模型构建向实践落地应用转型，切实实现知识价值的质效提升。

结构转型：个体与社会的双重适配——知识跃迁的最终落脚点在于知识结构的转型升级。这种转型升级体现在个体层面，也贯穿于社会层面，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体系化优化格局。从个体层面看，学术大众化让社会大众能够便捷、高效地获取多元化学术知识，打破单一化、碎片化知识结构的局限，逐步形成“理论+实践”“专业+通识”的复合型知识结构，更好地适配新时代社会发展对多元人才的需求。

从社会层面看，体制内与体制外学术力量的深度互动与有机融合，推动整个社会知识体系从“体制内主导的单一化结构”向“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协同化结构”转型，实现知识生产、传播、应用、反馈全链条的优化升级。

这种全方位的知识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有效提升社会整体的知识素养与认知水平，更能够为高端学术地位的重塑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高端学术不会变成脱离大众、悬浮于社会的“空中楼阁”，而是植根于大众认知、服务于社会需求、引领社会发展的“价值核心”。

进一步看，数智化时代学术生态的重构，并非否定高端学术地位的核心价值，而是构建“大众基础支撑—知识升级赋能—高端引领发展”的良性循环体系，实现高端学术地位的动态重塑与优化。体制外学术力量以自媒体为赋能载体展开“跑马圈地”，其核心依托是学术大众化的独特优势；学术大众化优势的充分释放有效推动知识体系实现跃迁，促进个体与社会层面的知识结构转型升级；知识结构的全方位优化为高端学术发展提供更广泛的受众基础、更鲜活的研究素材、更多元的创新视角，推动高端学术地位从“资源垄断型”向“价值引领型”转型；重塑后的高端学术地位，反哺学术大众化的持续推进，为社会大众提供更高质量、更具引领性的知识内容，引导初期的无序竞争走向成熟的良性协同，最终形成闭环式、可持续的学术生态发展格局。

在这一逻辑闭环中，体制内与体制外学术力量的关系可以实现从“对立博弈”向“协同共生”的根本性转型；体制内学术力量凭借深厚的理论积淀、完善的科研条件与权威的学术资质，承担起知识跃迁的引领者、高端学术的守护者与学术规范的制定者角色；体制外学术力量凭借自媒体传播优势、实践场景贴近性与内容创新活力，承担学术大众化的推动者、知识应用的落地者与学术生态的激活者角色。二者协同互动、优势互补，既巩固高端学术的价值引领作用，又充分释放学术大众化的社会价值，有效破解传统学术生态的活力不足、供需脱节等问题，推动整个学术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

总之，推动大众学术健康发展，既是一项文化工程，也是一项民生工程。数智化时代的学术生态变革，目的是实现高端学术地位的重塑与学术生态的良性循环。这既顺应了数字时代知识传播的内在规律，又精准满足了社会对学术价值多样化、普惠化、实用化的需求。未来，要持续推动体制内与体制外学术力量的协同共生，充分发挥自媒体的赋能作用，持续释放学术大众化优势，不断助力知识跃迁与知识结构升级，进而助力实现学术生态的持续优化与知识价值的最大化，为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为上海市团校学科建设部部长、副教授)

学术大众化新变重构知识生产